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5 期（总第 365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0年 5 月 5 日

-
- ◆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张红宇（1）
 - ◆ 中国黄金桑产业概论.....任荣荣（4）
 - ◆ 我国扶贫成就举世瞩目.....郭书田（6）
 - ◆ 乡村振兴战略五处发力.....韩 俊（9）
 - ◆ 水土生态理论是重大科学问题.....孙发政（13）
 - ◆ 中国农村改革在激烈争论中实破.....张晓山（17）
 - ◆ 105 岁高龄老人石山同志的谈话记录.....郭书田（33）
 - ◆ 从全球大背景看我国“三农”发展走向.....叶兴庆（35）
 - ◆ 新型城镇化要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王琳杰（39）
 - ◆ 从“家庭农场”到“农民合作”：恰亚诺夫的合作化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潘 璐（41）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张红宇

农村土地制度进入“公有共享”阶段

中央一号文件在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中，着重强调要抓好农村重点改革任务。对此，张红宇认为，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村改革的主线，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还原了土地家庭经营的最优本源，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家庭分散经营也不断暴露资源配置效率不优的缺陷，在坚决稳定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农村土地制度进入以土地经营权共享为特征的“公有共享”阶段，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制度创新，公有共享也成为当前和未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张红宇表示，传统农业是生存农业，现代农业是竞争农业，要提高中国农业的质量效益竞争力，家家有地、户户种田的小规模经营方式显然无法适应。从全球经验看，通过租地、入股方式使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集中，形成规模经营基础是普遍现象和做法。中国农地的“三权分置”制度设计，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在新型经营主体之间共享的方式，实现了“农地农用农民用”向“农地农用全民用”的转变，在保持了家庭经营基础的同时，使土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土地的经营权利在更多主体中得以分享，为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张红宇认为，中国实现规模经营一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由农户拥有的承包权派生出租、转包、互换、入股等多种方式让第三方分享其经营权，比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条是土地经营权不流转，农户将重要的田间作业环节托转给新的服务主体，即实践中的土地经营全托、半托形式，形成服务规模经营，解决“地怎样种好”的问题。无论是经营权全部转让，或是部分转让，都形成了新条件下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共享，这种公有共享的土地制度创新格局极具中国特色，在东亚人多地少的资源状态下，为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其意义十分重大。

近年来，农民惜地情结更甚，导致地租成本不断上升，新的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经营的积极性受到遏制。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7年全国经营权流转的土地面积为5.12亿亩，到2018年发展为5.39亿亩，增速为5.3%。而同期全国农业托管面积达到13.84亿亩次，按照综合托管系数计算的托管面积达到3.64亿亩，2018年比2017年增加了50%。充分表明相对于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的增长，不流转土地经营权，而通过托管、半托管形成的经营权共享发展速度更快，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倾向于在土地经营权归属明晰并有保障的基础上，

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共享经营权。土地不流转而转向服务形成的规模经营，成为土地制度创新的大趋势。

但是，张红宇强调，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权退出等都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度，把握好农户承包经营权退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能侵犯农民利益。“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减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是我们必须树立的底线思维，是任何时期任何情况都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

家庭农场具有不可替代优势

一号文件强调要“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在张红宇看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与土地制度相伴而生，这既是土地制度创新的结果，也是农民内部分工分业的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要继续创新发展，明确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激活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深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变。

张红宇指出，要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基础性作用，其具有产权关系清晰、治理结构单一、利益关系直接、监督成本较低等显著特点。在农产品直接生产过程中，家庭农场既能保证最大产出还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其他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农业经营主体中 90%以上属于家庭经营，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中始终具有稳定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也要充分拓展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农民的纽带效应，可以为普通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提供市场信息、农资供应、绿色技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机作业及维修、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营销等全方位生产性服务，通过专业和规模化服务连接千家万户，连片种植、规模饲养。特别是近年来新兴的托管、半托管等农业服务模式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满足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兼业化、老龄化导致的农业对经营性生产服务的需要，同时也拓展了规模经营的内涵，为现阶段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另外一条可选路径。

张红宇表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在各司其职，寻求主体之间的联合经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互利共赢。无论哪类经营主体，功能定位如何，如何分工协作，其发展的主要目的，一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组织、带动、提高、富裕农民，真正提升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优化收入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在改革发展中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丰富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通过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的创新，探索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农村集体经济。

培育壮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要着眼于职业农民的培养，打破人才瓶颈。新型主体和职业农民培养不仅要注重数量增长，更应聚焦质量提升。首先要有情怀，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需要从业者拥有乡土情怀，有感恩、奉献精神，不能急于求成，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能力，成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是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要求。其次要具有工匠精神，追求品质，

注重细节，精益求精，这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要具有创新意识，无论是传统农业的高端发展，还是各类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都要有创新精神，要敢为人先。四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带头人，不仅自己要致富，而且要带动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群众共同发展，共同致富。

产权制度改革是第二次飞跃

今年一号文件强调要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序开展集体成员身份确认、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等工作。探索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强化集体资产管理。张红宇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产权制度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可以媲美大包干的第二次飞跃。但坦率地讲，我们对于产权制度改革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刻程度还远远不够。”他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重大制度创新之后，中央部署的又一项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的重大改革任务，是与土地制度改革同等重要。

实践证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就比较繁荣，基层社会治理就相对有效。当前农民增收的一个短板就是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要管理好、经营好集体资产。各地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认识这项改革的重要性，树立“早改革早受益、早改革早主动”的思想，越是农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区县，越是需要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提升，破解农民“一朝跨越温饱线、多年未过富裕门”的难题，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实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

同时，张红宇认为，由于农村集体经济长期累积的底数不清、产权不明、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致使农村集体资产利用率不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阻碍了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升。正因如此，中央对于这项改革高度重视，并规划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时间紧，任务重，改革的推进工作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有几个方向性的问题张红宇认为值得关注。一是要将产权改革与新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盘活用好集体资产，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利用集体资产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吸纳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二是要将产权改革与新的集体经济发展形式结合起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服务性合作社等的产生与发展，创新了农村的组织形态，为农村经济注入了发展动力，为组织振兴提供了优质土壤，也拓展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新内涵，对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改革，集体分红无论是几百元、上千元还是几元、十几元，都是新的集体经济萌芽、发展、壮大的标志，可以使集体重新建立存在感与权威性，让农民意识到集体还有资产，村民还是股民；也拓展了集体经济建设思路，让农民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与期待。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记者：刘琪；来源：爱思想网 2020 年 02 月 17 日）

中国黄金桑产业概论

——一论中国的黄金桑产业

任荣荣

一、农桑立国的历史性树种

桑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农业文明、农业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蚕桑产业历史悠久，螺祖养蚕成茧，抽丝而成蚕丝产业，只是用了桑树资源的 3.5%，但是开创了中国的蚕桑大业，在悠悠五千年中，分别成就了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陆地、海上、内陆丝绸之路；立法植桑，以法护桑，农桑立国的历史记载表明了中国桑产业在治国理政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二、保护国人健康，发展大健康产业的基础性树种

中华医药源远流长，作为药食同源的植物，桑树史称神树，其叶称为神仙叶，果实叫神仙果，对中国历代本草药典统计，可治 170 余种病。实际上桑树内含的生命物质是目前植物界中最宝贵最接近人体免疫系统所需的各类营养物质，因而它才是中国八亿亚健康人群迫切需要的全价营养素，有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加强和提高。同时，对于禽畜类动物的大健康也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一种植物内外兼治如此之多的“病”在全国全世界绝无仅有。如算经济账，全国人民因节省的医药费当以万亿来计。

三、保卫国土安全的东方神树

防治治沙，水土保持得益于桑树具有十分发达的根系。在黄土高原，入土根系深可达到九米，现代实际测算，其根系生物量远远超过整株生物量的 64% 以上，而且全株都是药材。所以它是提高改善国家土地利用价值的灵气树种。

在中国桑树分布之广，无论中国东西南北中，都有分布。在北方它能耐零下 30-40 度的严寒，在干旱炎热的沙漠、沙地和干热河谷，更能忍受 40℃ 以上的高温；在石漠地区，还能充分利用其发达而有灵气的根系穿缝抱石。在长江三峡水库的消落带，经没顶水淹三个月而不死，水退即萌芽发叶。一旦发生森林大火，尽管地上部分为大火烧毁，一场好雨其根又能萌发新芽而成新树。

如此强大的抗逆性树种，在中国树种中无出其右。在重金属严重污染的粮食产地，所产粮食甚至不能作

为饲料，更遑谈供人食用了。

但是种植任氏桑树，则无此忧，论产量、产值、经济效益，一亩桑林可顶几亩好地。桑树和其他植物比较，具有无与伦比的消除和看守、螯合重金属的能力。我们在湖南株洲做了千亩面积的试验，证明了桑树对于土地重金属治理是一条捷径。

四、生产蛋白质的王牌树种

转基因大豆遍布世界，中国进口量为世界之最，中国畜牧业最重要的蛋白质生产基地在外国人那里，中国大豆加工产业几乎全面失陷。本来是受国人质疑的转基因大豆，却成为某些国家制约扼杀打击中国的生物武器。其实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普植桑树几亿亩，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好、最大的既能防疫又能改善畜牧产品的蛋白质生产大国。

一亩地转基因大豆，所产的大豆达到 200 公斤应算是丰产，所含的转基因蛋白质按 40%计达到 80 公斤，够惊人了！可是一亩地任氏桑树，可生产 1.3 吨干物质，蛋白质含量按最低标准 15%计，每亩蛋白质产量为 195 公斤，是转基因蛋白质的 2.44 倍。进口 9000 万吨转基因大豆相当于要 4.5 亿亩土地，如果利用饲料桑来替代进口大豆，则巨额的外汇支出就转化为农民的收益，这是精准扶贫增加农林就业意义非常重大，此外用地也仅需要 1.85 亿亩。桑树无需年年栽种，一年造林至少几十年可永续利用。而且不需要好地。中国荒地、荒漠、沙地、滩地面积巨大，全国江河滩地水库消落带就远远超过了一亿亩。由此看来，桑树在世界分布中，我国是分布中心，如果转基因大豆是一种武器，则桑树更是稳定国家农林业发展的生物重器！对一带一路上的第三世界无疑也有现实意义。

五、20 年的科学技术实践总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桑产业的产业技术路线基本明晰，产业技术系统问题基本解决，其生态、社会、扶贫、致富等潜在价值可能超过 10 万亿！是提升国力，改善整个生态环境成为国家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性举措之一。桑树作为黄金桑产业的支柱性树种绝不是浪得虚名。但是作为具有天地灵气的树种，要真正支撑起中国黄金桑产业还必须要有政策的支持，有德才兼备的“人杰”带领群众去奋斗，唯有如此，方能在人们眼中。普遍而平凡的桑树成为修补天地灵气的神树；使绿水青山成为天材地宝的绿色资源库；农林产业结构顺利调整；供给侧产品层出不穷，弱势劳力得以成为相应的就业人员。最后，造福江山社稷利国利民。让中国龙重振历史上的雄风进而更强大！更伟大！

（作者：中国林科院教授，重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 6 月）

我国扶贫成就举世瞩目

郭书田

向贫困作斗争，是全世界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联合国的一项重点工程，几位秘书长都为减少营养不良的人口作出不懈努力，取得一定成效，由 10 亿贫困人口减为 8 亿。而绝对数仍然很大，由此引发出大规模的移民问题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成为一些国家最头痛的棘手问题。

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贫困人口居多的大国。按照中国的标准，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人口在 1978 年高达 7.7039 亿，占当年总人口的 80%。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多项措施，开展扶贫工作。1983 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三西地区”（指甘肃的河西、定西与宁夏的西吉、海原、固原）开发领导小组，由曾任上海、天津、北京三个直辖市书记与农业部长的林乎加主持这项工作，成立了办公室，在最贫困的地区开展扶贫工作。1986 年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设办公室（简称“扶贫办”）。1994 年国务院制定了《八七扶贫计划》，确定在今后 7 年内基本解决 8000 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计划。2007 年中央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先后三次调整扶贫标准：1985 年为人均收入低于 206 元，2008 年为 1196 元，2010 年为 2300 元。经过努力到 2015 年贫困人口降为 5575 万人，至此有 7 亿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增加巨额的资金投入，采取多种扶贫方式，实行精准扶贫，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 1000 多万。到 2018 年底，全国 14 片 832 个贫困县，按现行标准，已经摘帽 436 个县，占总数的 52.4%，贫困人口还剩 1600 万，2019 年降为 551 万，尚未摘帽的贫困县有 50 个县，将于 2020 年全部脱贫。

回顾一些地方在扶贫工作中创造的宝贵经验，需要实事求是加以总结。

一、东部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于 2015 年全部完成消灭绝对贫困的任务，包括从省——市——县——乡——村——户六个层次，脱贫标准为人均收入 4600 元，比全国现行标准提高一倍，接近联合国的国际标准，走在全国前列。他们的经验：（1）全省以村为单位推行股份合作制，将土地等集体所有资产以股份形式量化到每个农户，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收入占的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以温州为源头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在全国五（税收占 5%）、六（GDP 占 60%）、七（技术创新占 70%）、八（劳动力就业占 80%）、九（企业数占 90%）的格局中占到第一位；(3)从本省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出发，发展具有浙江特色的产业，一二三产业融为一体，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全国水平。它的特色表现在地市——县——乡——村，一村一品不雷同化；(4)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农民人均收入多年呈两位数增长，缩小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以经济为中心，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发展。

二、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的贵州省，是中国喀斯特地貌石漠化重点区域，是最穷的省份之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亩平，人无三分银”。改革开放以来，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土地包干到户，发展经济，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 年与 1949 年相比，人均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由 44 元上升为 9716 元；粮食产量由 296 万吨上升为 1059 万吨；2018 年粮食与经济作物之比为 35:65，石漠化面积减少 80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7%，世界自然遗产数量居全国第一；贫困人口由 1978 年的 1840 万人减为 2018 年的 155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为 4.5%，33 个贫困县已经脱贫摘帽。

他们的经验：（1）坚持大胆改革，在实行土地包干到户的同时，推广湄潭创造的“增人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经验；推广六盘水创造的“三变”（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的经验，实现了“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人人能就业，月月有分红”；（2）要致富就要先修路，将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实现了公路、铁路、航空一体化运行工程，使 100%的建制村通了路、水、电、邮等；（3）大力发展有本地特色的第三产业，包括遵义会议址、四渡赤水河遗址等红色文化产业等，黄果树瀑布的自然风光以及茅台酒文化产业等；（4）利用当地气温平均 19°C 的优势，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以及各种国际活动等特殊产业，国际马拉松赛就在六盘水举行；（5）对无生存条件的村，采取整村易地搬迁的办法，促进小城镇建设，城镇化率由 1949 年的 7.5%上升到 2018 年的 47.5%，100%的建制村实现了通客运、光纤网络、4G 网络。2018 年成立了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有 200 家国内外科技企业巨头到这里来创业，成为中国的“数谷”，一家日本的媒体称“贵州奇迹”，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试金石。

三、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荒漠化的重点区域，是西北最穷的省份之一。贵州有个六盘水，宁夏有个六盘山，长期以来，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宁夏先后六次探索易地移民生态移民等办法，特别在“十二五”期间，自治区投资 105 亿元，为六盘山实施移民 120 万人的生态工程，固原市的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12.8%上升到 2018 年的 25.1%，林草覆盖率达 73%。他们转移劳动

力 29 万人，就业收入 35.88 亿元，人均 12372 元。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 48.14%。宁夏除了发展枸杞、滩羊、甘草传统产品外，还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如黄花菜、晒沙瓜、山杏、马铃薯等。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盐池县，盛产滩羊，2018 年成为宁夏西海固地区 9 个贫困县首个摘帽的脱贫县区，众多家庭以养殖滩羊脱贫。西吉县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地，具有发展红色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成立了林下经济合作社，构架梯田景观，兴办篝火晚会，开设农家饭庄等乡土工程，龙王坝村年接待游客 16 万人次，整村实现了脱贫。

这三个省的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能取得扶贫工作的重大成就，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勇于突破禁区，大胆创新，采取股份合作的办法，促进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把集体所有资产量化到每个农民身上，把发展经济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最大限度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从而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产业，就能改变贫困面貌，脱贫致富。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来，各地的股份合作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的文件上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发展股份合作，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是农村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到目前为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第四批)包括 12 个省份、39 个地市、163 个县(市区)的改革试点，计划到 2020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目前土地的“三权分置”对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接近完成。在试点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老问题：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主体缺位；二是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1999 年至 2018 年，在土地“农转非”中的出让金高达 40.5 万亿元，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即以地生财的体制。需要通过深化深层次改革加以解决，最终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这必然涉及对现行几部法律的修正。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按现行标准全部脱贫，即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重大创举，为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最为有力的重大支撑，在全球反贫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现行标准比较低，消除相对贫困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付出艰辛的重大努力。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一定能够完成消除相对贫困的任务，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益的经验。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本文写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修改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

乡村振兴战略五处发力

韩 俊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重新发现并利用好乡村的多元价值，让现代化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找出来，解决好。

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要充分发挥农村资源、生态、文化等优势，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截止到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近两年，顶层政策设计持续完善。其中，省区市每年向党中央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的制度已建立，并延伸建立市县报告制度。到 2019 年底，省区市建立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

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他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以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为根本，坚持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

《瞭望》：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

韩俊：1995 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顶峰时为 8.6 亿人，到 2018 年农村常住人口已降至 5.6 亿人，减少了 3 亿人。下一步，如果按照 2030 年我国人口峰值 14.5 亿人、城镇化率 70%来测算，未来 10 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还将减少 1.3 亿人左右。

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2018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8.3 亿人，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接近 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 44%，相差 16 个百分点，也即约有 2.26 亿农民长期生活在城镇，但还未有户籍身份。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全国离开土地的农民有 2.88 亿人，其中常年举家外出务工经商的有 3000 万户。过去 40 余年，农民大规模离土离乡，完全改变了我国就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所以推进城镇化一定要回归到推动更多的人口融入城市这个本源上来，继续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瞭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什么深刻关系？

韩俊：现代化必然是由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乡村共同组成。我国之所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原因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农村仍有4亿多人口。没有乡村的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民进城了，城镇化发展了，“三农”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重新发现并利用好乡村的多元价值，使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能够相互协调，形成双轮驱动，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让现代化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四个优先抓好“三农”

《瞭望》：如何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韩俊：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找出来，解决好，不开空头支票。同时，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说到做到，让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具体的做法，就是做到四个“优先”。

一是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把优秀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把精锐力量充实到基层一线，注重选拔熟悉“三农”工作的干部充实地方各级党政班子。近日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懂“三农”，会抓“三农”，分管负责人应该成为抓“三农”的行家里手。

《条例》强调，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其主要精力要抓“三农”。同时，提出要选派优秀干部到县乡挂职任职，到村担任第一书记，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干事创业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使用优秀的农村工作干部。

二是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出格局，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引导和支持人才、资金、技术、科技等各类发展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和集聚，释放农村发展潜力。

《条例》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医生队伍素质，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和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等。

三是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县域新增贷款主要用于支持乡村振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要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

据初步测算，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确定的重点任务，总投资需要7万亿元以上。尽管当前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但压力再大，也要按照中央要求，把“三农”作为优先保障领域，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

四是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近1/3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收集和处理，80%的村庄生活污水无法处理，拥有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只有48.6%，1/3的行政村内的道路没有实现硬化。下一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还比较繁重。

以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为根本

《瞭望》：当前如何围绕让农民富裕起来推进乡村振兴？

韩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要充分发挥农村资源、生态、文化等优势，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化、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实现产业兴县强村，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一些区域性的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

二是农产品既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现在许多优质农产品还是在田头卖，还是提篮小卖，还是“披头散发地”卖，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要学会给农产品“梳妆打扮”和营销宣传，加强农产品产后的分级包装、仓储物流营销，特别是加快补上冷链物流等短板，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做足文章。

三是大力发展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当前，乡村基础设施落后，最突出的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落后，要培养大量适应数字农业发展的人才，赋予农民更多的数字化工具。

四是让农民合理分享农业产业链的收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但也不是简单地以一产去接二产、接三产，关键是完善各类利益主体的联结机制，通过就业带动、订单农业、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能够合理地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五是粮食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多年来，我国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就是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农民种粮吃亏是粮食生产最危险的时候。二是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保障产粮大县抓粮得实惠、有发展，不能让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越吃亏。

制定粮食政策，要始终把这两点作为最基本的立足点，各级地方政府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任何省区市无论耕地多少，都要承担粮食生产责任，特别是粮食主销区要切实落实责任，不能把“饭碗”的问题都丢给别人去解决。如果一个地方真的把粮食生产搞没了，就是抛弃了责任。这方面需要有硬约束。

更好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瞭望》：在继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什么说要更好地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韩俊：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同时也是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是把文化建设放在乡村振兴更加重要的位置。乡土文化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传统的建筑急剧减少，乡村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文化特色遭到破坏。

以城市审美标尺改造农村的做法，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乡村建设退化为简单的环境整治，甚至等同于建筑立面的化妆式改造，乡村建设“千村一面”，乡村美食、文化习俗、传统手工艺、生活形态日益“去乡土化”，乡村社会关系和文化特色在一些地方快速消失，乡村文化甚至日渐荒芜。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这是我们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把乡土文化传承保护好，还要不断地发扬光大。乡村振兴要提倡见人、见物、见生活，传承活态的乡土文化，保存文化基因，守护文化根脉。

二是提升乡村文明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当前，乡村文明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不养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违背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一些农村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和过度消费盛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弘扬乡村文明。

三是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有效的治理，就没有乡村全面的振兴。目前，乡村治理仍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薄弱环节，要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点从治理理念更新、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手段创新等方面综合施策，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一定要从容建设

《瞭望》：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怎样才能保证不走偏、不变样？

韩俊：现阶段，有的村庄肯定要向城镇形态演变，像大城市郊区村，有的村庄会长期存在，有的村庄会逐渐衰落消亡，这符合村庄演进规律。但哪些保留、哪些整治、哪些缩减、哪些做大，都要科学论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只有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才能不走偏、不变样。

乡村振兴一定要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能光追求速度，特别是不能不顾农民意愿，把建设城市那一套放到农村照抄照搬，大搞撤村并居集中上楼，搞得治理半径越来越大，基层组织离农民越来越远。

村庄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要扎实做好市县村庄空间布局规划。要科学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型村庄规划，注重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保留乡土风情风貌，不断挖掘田园和乡土价值，扬农村之长、补农村之短，打造各具特色美丽宜居的现代乡村。

（本文系韩俊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的采访）

水土生态理论是重大科学问题

孙发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竞争力向基础研究前移，科学探索不断向宏观拓展、向微观深入，交叉融合汇聚不断加速，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着重大突破，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产生颠覆性技术。我国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为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创造环境和条件。水土生态理论是面向生态环境科学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关系到生态环境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问题，是“从0到1”的基础研究、前沿引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水土保持学与生态学交叉融合的新课题，对于生态环境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1. 问题的提出 生态环境的提法在理论上是有争论的，只不过是如今普遍采用了，也算约定俗成。但不是说生态环境的提法是科学的。“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是指主体周围的空间及空间中存在的事物，从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上看，它包括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中的物质成果部分。而生态学，最早是由德国动物学家Haeckel于1869年提出的，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1909年，E. Warming提出植物生态学概念；1935年，英国植物学家A. G. 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理论；2004年，中国生态学家孙发政提出水土生态理论。生态的内涵，是指生物之间及其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可见“生态”与“环境”两者在内涵上是有本质区别的。生态就是生态，环境就是环境。因此，生态环境的提法并不严谨，而生态与环境的提法才是准确的。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仅讲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美丽还是不够的，江山富饶美丽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本质要求。这一点，需要从理论上阐明清楚，避免只讲生态环境美丽，而不讲经济发展；或只讲经济发展，而不讲生态环境保护。

由于生态环境在理论上有不足，往往给实际工作带来迷茫，比如，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认为是一个概念，实践上抓不住问题的要害。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部门还是搞的环保老一套，主要抓环境污染防治。而生态环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应该是水土生态问题。水土保持虽然是基本国策，但还是只有水利部门主管。生态环境领域，包括水土保持，常常以问题为导向，在出现了问题之后，再去亡羊补牢，代价是高昂的，有的再也无法挽回。这些年来，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声音依然存在，生态与经济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政策制定上也有反复现象。原因在于生态环境领域缺乏科学的理论遵循，理论落后于实践。

1934年治理黄河泥沙时提出的水土保持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而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水土保持理论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通常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土保持生态治理等来表述水土保持实践。一些地方已经将水土保持部门改为生态环境中心，海绵城市建设也独立于水土保持之外。可见，水土保持理论的创新非常之迫切，否则，水土保持空间将越来越小，学科的发展将严重僵化。

水土生态理论揭示了自然界水、土、植被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一般规律，在规划、建设、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水土生态涉及到水土保持、国土、林草、环境等多部门，水土生态理论应用到水土保持上，使水土保持由1.0版，升级为水土生态保持2.0版，拓宽了水土保持空间，在发挥好水土保持部门现有机构的力量同时，应成立国家水土生态保持委员会，统筹多部门力量，强力推进美丽富饶中国的实现。

2. 问题的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写入党章、宪法，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水土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设立了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发展”，保驾护航。这些机构的改革还只是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还没有探究到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导向。水土生态理论，深刻地阐明了生态、环境、资源的关系，抓住了生态问题的本质，回答了生态环境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没有处理好人与水的关系、人与土壤的关系、人与植被的关系，以及人与水土、植被三者整体关系即水土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二水土生态退化，三是资源衰竭。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水土生态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无论是生态、资源，还是环境，都离不开水、土、植被三大要素，三者既是生态的主体，又是环境、资源的载体，水土生态理论找到了生态、环境、资源的集合点。当前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有水土生态重大问题，新兴产业热点领域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态势，如光伏产业、风电产业等，这些建设破坏和占用的绿水青山，因钢筋混凝土建设，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自然水土生态。大气雾霾的危害，追溯其原因，也是因为人类对自然水土生态的破坏、大地钢筋水泥化后，人为活动造成的次生的空气污染。绿水青山不会产生雾霾。水土生态理论在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维护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需要确立水土生态理论的指导地位，把解决生态、资源、环境诸多问题，从以问题为导向，转换到以水土生态理论为导向的科学轨道上来。

二、水土生态理论研究进展

1934年针对治黄工作，为防治黄河泥沙问题，由李仪祉、张含英等先辈首先提出“水土保持”一词，作为专用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土保持”从形式到内容上已包罗不了当今的社会实践，如建设项目中滥用工程措施，制造大面积浆砌片石、水泥砂浆护坡；引入外来物种保持水土等。虽然防治了水土流失，但对生态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水土保持不仅是保持水土，更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持健康生态系统。

因而，人们较多地使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来表述水

土保持的丰富实践。将这些提法统一起来，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的高度，有利于生产和水土保持学科的发展。2004年11月8日，笔者作为《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封面人物（当年封面人物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首次提出“水土生态”概念。水土生态概念的提出，克服了传统水土保持所遇到的一些局限和困惑，更加系统地、综合地、科学地解决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此后在《中国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学报》《中国草地学报》《风景园林》《今日国土》《中国领导科学》《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结合在世界各地考察交流的成果和丰富生动的生产实践，形成了水土生态理论体系。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曾大林副司长指出，水土生态理论将大大拓宽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域，开创水土保持工作新局面，对基础理论研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牛崇桓副司长也撰文提出水土生态与人类相容共生的理念；时任深圳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处长吴长文教授和赖涛博士发表论文指出，水土生态理论对于我国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维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笔者在《中国科学报》整版发表“水土生态的哲学思考”，提出用水土生态哲学大智慧来认识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问题；2020年第2期《中国水土保持》杂志上笔者发表“用水土生态理论推进美丽富饶中国实践”，深刻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水土生态原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方式和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影响；为了推动水土生态理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深圳市水务学会成立了“水土生态专业委员会”。

水土生态理论是关系到生态环境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科学问题，是由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前沿科学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维护，以及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同时，水土生态理论是水土保持学与生态学交叉融合的产物，将会产生一门新的学科——水土生态学，为国际生态环境领域注入新的理论动力。为此，需要广泛地传播水土生态理论，搭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平台。水土生态理论还推动着水土保持学的发展，甚至给传统水土保持理论带来颠覆性的冲击，有必要开展学术界的大讨论。而根据这一理论，成立国家水土生态保持委员会，还需要国家最高行政部门的决策。

三、水土生态理论的重大意义

没有先进的理论，很难有成功的实践。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事如愿违。水土生态理论对生态环境进行深入剖析，由表及里，抓住事物的本质，能够事半功倍。相反，理论上含糊不清，就找不出实际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水土生态理论是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理论体系，是认识和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是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理论基础。

水土生态概念的提出，使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找到了系统分析、综合治理的理论依据；既有传统水土保持内涵，又涵盖当今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践。在规划、建设、管理方面，需要做好显性和隐性水土流失防治，减少对自然水土生态的侵占和破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其次，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水土不分家，有了水土保持；水土植被不分家，有了水土生态理论。地球上凡是有水土的地方必然有植物的生长，而植物的生长又培育着水土资源。保持水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植被（包括农作物、果

树、牧草)；植被繁茂与稳定，是保持水土的初衷，离开植被谈水土，显然无意义。只有植被的恢复和发展，才能保护赖以生存的野生动植物，广泛地治理水土流失，从而稳定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居环境，进而在此基础上防治大气污染和气候变暖等诸多问题。水土生态理论拓展了水土保持空间，真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水土生态理论是水土保持认识观的深化和发展，是生态科学的创新与拓展。它是指地球上水土与植被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与发展的一种生态平衡关系，从广义上说，是指水、土、植被在其运动和演化过程中的一切关系的总和。水土生态理论揭示了生态问题的本质，在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连续性，发挥系统生态服务功能，需要抓住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这就是水、土、植被三大要素。水、土、植被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了地球上水土生态的生动景象。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是人与水的和谐、人与土的和谐、人与植被的和谐，以及水、土、植被之间的生态平衡与稳定。建立在水土生态平衡之上的生产、生活、经济建设，才有天蓝、地绿、水清的基本保障。水土生态是自然界水、土、植被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一般规律，在规划、建设、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生态问题已不是那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为了发展经济，世界各国都在争先恐后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地球生态环境前景令人担忧。人类所作所为如果危害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水土生态系统，不仅危害生物界所有物种，最终危害的是人类自己。

工业化和城市化无休止地将众多山头、森林、草原、农田、湿地、湖泊等夷为平地，使之硬化，建大厦、小区、工厂、道路、机场等，不仅生物生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还污染环境，特别是大气雾霾。土地的硬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引起全球水循环和气候变化。这些问题，其根源还在于破坏和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中三大要素即水、土、植被的原生状态及其水土生态平衡，致使生态系统破碎，生态功能失调。

人类文明不管如何继续，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水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支撑；人类文明只有在保持与水土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能不断前行。在当代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面前，要维护水土生态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强调水土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保障城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水土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水土生态理论是关系到生态环境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对于地球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将会产生新的“水土生态学”并推动水土保持由1.0版升级到2.0版，很有必要成立国家水土生态保持委员会。

(作者单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村改革在激烈争论中实破

张晓山

摘要：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 年是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出现历史转轨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带来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以往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 1977 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一连串变化，高层也开始酝酿结束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并为此寻找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1978 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时，高层没有出现太大分歧，说明中国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力。当然，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所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国家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的共识也会困难得多。

关键词：转向；改革开放

人们一般称 1978 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 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 1977 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 1978 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一、“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中国改革何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 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 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

不止是年轻人，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499页。）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81—1782页。）。“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化大革命”、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解放。这一道理如同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乡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31、1244—1245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而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参见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参

见陈敬编：《经济理论 20 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79 页。）。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77 年和 1978 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例如，薛暮桥 1978 年 4 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 月，他还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现在管理体制根本缺点是，不管是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而因为没有外汇，需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而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得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共花了 8 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参见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 年第 71 期。）因此，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规律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 年第 71 期。）。

拨乱反正不止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向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陈敬编：《经济理论 20 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 12 页。）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 1134 页。）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推动的。

二、改革的经济动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1977 年 2 月 12 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 1974、1976 两年停滞不前，1976 年只增长 0.6%，钢产量倒退 5 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 3 年出现赤字，1976 年财政收入只有 750 亿元，相当于 1971 年的水平（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未刊稿，第 13 页。）。据估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 5000 亿元，相当于建国 3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8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12 月 12 日），中国网，2012 年 9 月 7 日。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9/07/content_26747577.htm。）。1978 年 2 月 26 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正式报告中首次出现“崩溃边缘”的说法。

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的判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 1952 年至 1975 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却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转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第 7 期。）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1967 年至 1976 年的 10 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尽管不少人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存有疑问，笔者仍愿相信“文化大革命”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经济困局的事实。这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例如，在安徽全省 28 万个生产队中，只有 10% 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 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 60 元，25% 的队在 40 元以下（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这也意味着，在安徽省 4000 万农村人口中，有 3500 万以上的人是吃不饱肚子的（据统计，1977 年安徽省总人口为 4627 万人，农业人口为 4000 万人。参见《当代中国的安徽》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603 页。）。农民的贫穷不只是在少数地区。在 1978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 2400 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 170 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 300 斤以下的有 45 个县，人均年收入在 50 元以下的有 69 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 2 倍，粮食增长不到 1 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年，第 388—389 页。）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 20 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 2000 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48 页。）1978 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现持续不断的上访和闹事风潮，其诉求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类民生问题。例如，在住房问题上，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3.6 平方米，比 1952 年还少 0.9 平方米。根据对 182 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 689 万户，占 35.8%。131 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有 86 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成人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有 189 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

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关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6期。）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这一时期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81页。）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自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动释放出巨大的民生压力，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条路很难继续走下去。国营企业效益日趋下降，同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年至1965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年、1976年两年为负增长，出现了自“大跃进”以来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从财政角度看，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也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参见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三、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农业上不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会议纪要指出：农业存在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有些多年来的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如四川省1976年就调进粮食20亿斤，棉花产量徘徊了11年，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从1973年以来没有增长。（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944页。）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所谓“普及大寨县”，除了“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1978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仍然提出“决战三年”基本实

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第926、952页；《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这明显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头指标。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至30%，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陈永贵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1975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审看陈永贵的建议后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批给邓小平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因多数省市不赞成，未形成一致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然而，到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却要求在全国已有7.7%的生产大队核算的基础上，选择约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到大队核算。随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阵“穷过渡”之风。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过渡的大队已达到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20%至7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52、957页。）

然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据薛暮桥回忆，他在1977年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变政策，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和农民有更多接触的地方负责人心里更加明白，这套办法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还走进了许多农户的家里。万里回忆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随行人员回忆说，万里看到农民的贫困状况后“泪流满面”（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特别是陈永贵的强烈不满，但舆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写了“内参”和通讯宣传“省委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记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产生经过》，《人民日报》1978年2月3日。）

邓小平也支持地方率先清理政策。1978年1月，邓小平在同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说：“我还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1978年2月，四川省委也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其内容与安徽类似，尤其强调扩大农民自留地和发展多种经营。安徽、四川两省的文件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当然，从总体上说，它们均未超出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农村政策，但是在两省执行后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取得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

到1978年，中央政策开始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7月19日，又转发了陕西旬邑解决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问题的报告，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调用民工过度以及干部强迫命令等普遍性问题。（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59—965页。）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在会上被推翻，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式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少数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也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即将展开的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这种现象也说明，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

四、扩大引进：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以及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寻找新的资源和方式。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广受诟病，但平心而论，他毕竟是一位务实领导人，对搞经济建设比搞阶级斗争更有兴趣。从1977年初起，他采取种种措施改善民生，先后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虽然还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老套路，但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已经是他关注的焦点。1977年，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1975年夏，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曾制定过一份“十年规划发展纲要草案”。1977年9月，“十年规划纲要”重新修订，并提出未来23年设想。新的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在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这个规划后来被视为“洋跃进”，受到诟病。袁宝华回忆说：“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但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想法，当时整个高层，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

当编制长期规划时，最高领导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197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31—36页。）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又连续三天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报告。扩大引进成为这两次汇报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国家计委报告提出10项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条是整顿企业，第二条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48—49页。）由此可见，引进新技术在完成未来23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中国领导人雄心很大，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方毅等高层领导人在讨论中对进一步扩大引进都很急切。邓小平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67页。）。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总理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要想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而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并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90页。）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28、236页。）。1977年9月邓小平复出后，还采取了两个大动作：一是1977年秋季恢复取消多年的高考，以适应快速培养人才的需要；二是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现有的科技力量。

70年代末，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其中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甚至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禁单项目还多500余种。），无法进入西方市场；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向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在这一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因此，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了。1978年，邓小平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走向强大，愿意支持中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1978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们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6页。）。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根据出国考察团带回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

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仅欧洲就有多达 5000 亿美元的游资。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日本、西德、法国争相借钱给中国。（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124 页；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 372 页。）由于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这是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有利时机，也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

从内部说，对于单纯的引进，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并不大。毕竟在过去已经有三次对外引进。第一次是 50 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 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第二次是在 60 年代以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为解决“吃、穿、用”问题，中国先后从日、英等 10 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 2.8 亿美元。第三次引进是 1973 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 43 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1973 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地排斥。（迟爱萍：《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对陈云对外经济思想工作思想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选（1956—1985 年）》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18—228 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83 页。）但这一设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是受困于党内斗争，如 1976 年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阻挠进口大庆大化肥厂项目，并与华国锋发生冲突（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36 页。）。而粉碎“四人帮”，则消除了政治上的掣肘。到 1977 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额 39.6 亿美元，包括 13 套化肥、4 套化纤、2 套石油化工、武钢 1.7 米轧机等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 年，第 IV—131 页。）。1977 年的对外引进是“四三方案”的继续，不过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 年 7 月提出的方案是 8 年引进规模至 65 亿美元；到 11 月，增加为 150 亿美元；到 1978 年 3 月，增加为 180 至 200 亿美元（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31、49、90 页。）。到 7 月至 9 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 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 800 亿美元之巨（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122、145 页。）。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 11 倍之多，其总量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1978 年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这与此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只有在 50 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进行。1964 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自以为骄傲的一件事。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过利用外资。1973 年，陈云提出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其中就有利用外资的内容。当时想到的利用外资的形式，是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参见陈东林：《陈云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2 期。）还有一种形式是延期支付。60 年代和 70 年代两次引进都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参见刘向东等编：《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 页。），这可以视为初级形式的“利用外资”。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中国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 1978 年春。当年 4 月 22 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一次对外讲话

中明确说，有六种做法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了，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仍然是不做的。（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第272页。）

然而，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条界线。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外资的条件，即西德、法国等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谷牧出访带回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以上这些事情都说明了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切心情。（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就国内而言，主要当时资金需求量大，实行大规模引进，外汇严重不足。1978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转引自〔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了许多办法，包括：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等。然而，对于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来说，所有这些仍然不敷使用，国内配套资金也严重缺乏。从何处筹集建设资金？有两种方案：一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二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积累已经达到极限，积累率在30%以上，只有降低，不可能再提高。因此，在国内出现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当时也断言：“如果不寻求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第87页。）应当说美国的这个推断还是准确的。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320页。）6月30日，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确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张树军，高新民：《共和国年轮：197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放手利用外资的问题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一个是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一个是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第274页。）

五、出国考察潮：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对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其实，出国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7

年初，一机部部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于1978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重点考察欧洲的企业管理。（程中原：《1977—1978：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汪志馨，项小米：《项南的沉浮人生》，《纵横》2007年第1期。）此外，还有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派出的考察团。起初，出国考察主要为了落实引进项目。1978年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百年潮》2002年第11期。）华国锋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18页。）

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高潮。究竟派出了多少个代表团出国？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至少有四个：一是197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二是3月28日至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这四个代表团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每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写出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这些报告除了提供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可行性论证，还提供关于被考察国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经验的说明。

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9—10页。）

赴日经济代表团报告认为：日本高速增长主要在60年代，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平均每年增长15.5%。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其“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该报告还指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实现后来居上，因此中国在技术上也应采取“拿来主义”。（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07页。）

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报告说：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很快，但中国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下降，国内商品在香港进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由27.4%下降到16.6%，远落后于日本。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的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宝安、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的动议是中央部委与广东省共同商议提出来的。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与宝安、珠海共同制定了生产和出口和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划。4月至月间，段云率团考察香港、澳门后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人介绍情况并交换意见，双方一拍即合。回京后，考察组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央。6月3日，段云

直接向华国锋等人作了汇报。华国锋肯定了他们的建议，明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转见李正华：《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第441页。）

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属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让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代表团行程为5月2日到6月6日，共计36天，先后访问了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80多家单位。期间，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范围涵盖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工艺和设施都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代表团回国10天后，起草完成《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之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中国被封锁和自我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工作的外，大多数领导人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未刊稿，第192页。）这些考察团所看到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很大。

第一个强烈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是超出中国人的想象。访欧代表团报告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供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出国考察团归来，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访欧团报告坦率表示：中国与发达国家比“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1—122页。）。

出国考察得到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包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06、122—125页。）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例如西德州一级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5页。）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也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庄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参见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这些现象使考察团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从而为领导人决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参见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事，还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人均住房达20至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也得到很好的治理，社会保持稳定。（参见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11月，王震访问英国。期间，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过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用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可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当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人员询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柯华：《在马克思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炎黄春秋》1999年2期；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陈独秀研究动态》2002年第3、4期。）

当时，影响更大的是同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作访日情况的报告。邓力群说：1955年至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2.1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至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有1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出访者观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社会风气还不算坏，车子不上锁，商店下班时不上门板，也没有听说有人偷，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邓力群说：人们的道德品质，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日益丰富，逐渐变得好起来。衣食足然知礼义，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日本经济情况——邓力群1979年1月19日在社科院党组学习日上的汇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45期。）邓力群对日本在十三四年内就实现了现代化，对日本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东京比北京“好很多”的社会治安，自然流露出钦羡之意，对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感触很深。反观中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拥有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仍然是多数家庭追求的目标，而在农村仍有2亿人口未解决温饱，相形之下，反差太大了。

邓力群、王震等人的观感是真实的、未加修饰的，大体反映了第一次身临其境体验资本主义的考察者们的共同感受。这些情况在党内和民众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次出国考察潮有一个特点：不是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挑刺，而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在情理之中。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随谷牧访问西欧的杨波回忆说：“对我个人来说，可

以说是开了眼界，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很多新情况，也改变了过去的某些观点。”（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六、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6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都参加并发表了意见。华国锋说：“看准了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19、120页。）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又听取并讨论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会，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均出席。大家兴致很高，汇报会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1点。聂荣臻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回忆录》，第306页。）大家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适应，非改革不可。”（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9页。）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议，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38页。）

华国锋对于考察团带回的信息不仅重视，而且很兴奋。据胡耀邦当时在中央党校传达时的说法，7月6日，华国锋把他找去彻夜长谈，从下午3点钟到凌晨1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涉及出国考察团从日本、西欧带回来的许多信息。华国锋反复问胡耀邦，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最后，华国锋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上）——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1978年是领导人密集出国访问的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繁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据随访的朱良回忆，华国锋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国锋看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便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当年年初，他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了朝鲜。10月下旬，访问了日本。11月，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又出访美国。邓小平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其

紧迫意识，也使其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问朝鲜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从朝鲜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还表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6—83页。）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由李先念、谷牧主持，规模并不大，到会的有六七十人，但规格很高。参加会议有国务院44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飚、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华国锋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他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42页。）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听取了主要汇报。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有30多位各部门负责人先后发言，几乎覆盖了中国建设的各个财经领域。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日本、西德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强化了领导层的紧迫感，但许多国家的经验也使出国考察人员普遍信心倍增。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所谓东亚“四小霸”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说明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华国锋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8页。）谷牧回忆说：“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谷牧回忆录》，第308页。）

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几个问题备受关注：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据于光远回忆，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对与会者很有说服力。（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报告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

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76页。）胡乔木等人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说：“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当然，会议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

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19页。）“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说明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所有这些，为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原定的议程主要是经济议题，但实际的议程转到更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也使得国务院务虚会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没有在会上展开讨论。（参见于光远：《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务虚会》，《上海综合经济》1998年第11期。）经济话题讨论较多的是农村政策，起草了两份文件关于农业的文件草案。然而，问题不在于三中全会是否对经济改革进行了多么深入、广泛的讨论，依照当时的认知水平，即使讨论也不可能超出国务院务虚会的深度。重要的是，会议充满了改革的精神。邓小平在他的主旨讲话中说：“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叶剑英的讲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批评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第187页。）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第4页。）

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摆脱持续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频繁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及此后几十年的变化都根源于这一“历史性转折”。二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探索打开了意识形态的空间。三是在“只进不出”的策略下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班子初步形成。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的方针。

（作者：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原所长；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105 岁高龄老人石山同志的谈话记录

郭书田

石山同志让女儿把我接到他的家里，交谈了有关生态环境与食品安全等问题。老人思维清晰，精神饱满，历时两个半小时，毫无倦意。现将谈话要点记录如下。

一、石老首先从接到云南生态农业研究所那中元所长在黑龙江五常县运用他创制的生物诱导剂技术，生产出来的不用化肥与农药的优质大米说起。他说，他不用化肥与农药生产出来的优质大米与农业部现在仍然用大量化肥与农药生产粮食，形成明显的对立局面，提出对此应好好研究。

农业部已宣布于 2017 年提前实现化肥与农药零增长的目标，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绿色农业，减少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量。但是，由于占全世界 9% 的耕地，使用量占全世界 30.40% 的化肥，不仅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而且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益，使种粮农民难以增加收入。目前，河南每亩地用化肥 100 多斤，成本 130 多元，加上大旱减产，收益是负数。全国如大幅减少化肥，就会使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这种局面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除了面源污染外，还有土壤重金属污染仍很严重，来源于饲料添加剂产生的禽畜粪便。这两项污染虽有所好转，而尚未根本改变，需要加大治理力度。

那中元创造的生物诱导剂，培育出小麦、玉米、水稻等多种粮食作物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品种，在多地试验效果甚好。在黑龙江五常县生产的粳稻，加上生长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强的气候条件，受到农民与消费者的欢迎。石老说，云南农业大学老校长当面对我说，中国农业现代化就要走那中元开创的新路子（利用祖传中医理论与中草药研制出不用化肥与农药的优良品种与种植方式）。

最近，那中元又在新疆、内蒙古等地，运用培育出来的玉米与大豆品种实行间作的栽培技术，每亩获得玉米 1200 斤，大豆 800 斤的产量，无一点污染，将禾本科作物与豆科作物间作，不仅高产，还能培肥地力，可以节省用地。如能在粮食产区普遍推行这项技术，就能大大扭转大豆大量进口（年进口 8000-9000 万吨）的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出现在大豆之乡的中国，是“国耻”。

二、石老说，早就听说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品种，虽然高产，但品质不好，农民种他培育出来的品种是籼稻，自己不吃，到市场去买（保姆插话：我的家乡是安徽芜湖，不吃这种籼稻），这怎么行呢？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籼稻，又是双季稻，产量超过 1 吨，号称“超级稻”，是由三个品系（恢复系、保持系、不孕系）杂交而成。由于是双季稻，生育期短，又是南方多雨季节，湿度大，昼夜温差小，日照短。这是自然缺陷。加上为了高产，又要多用化肥与农药，品质不会好，口感差，人们不喜欢吃。农作物的品种杂交方法改良已是一种常规技术，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科院从国外回来的鲍文奎教授做了小麦与黑麦远缘杂交的研究。北京农业大学李竞雄教授进行了玉米双杂交研究（两个不同品系杂交种的杂交）。沈阳农学院杨守宏教授做了北方粳稻的杂交研究，都有可喜成果。都应采取科学的客观态度，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石老说，任荣荣创造的饲料桑，也很有意义，应大面积推广。每亩饲料桑可养几只羊，不用粮食，很了不起。

任荣荣是中国林业科学院老研究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培育出用作畜禽饲料的桑树。开始在重庆三峡库区的消落地试种成功。由于根系特别发达而生长良好，随后在全国多点的沙荒地、丘陵地、盐碱地、滩涂地

等非耕地试种成功，既能缓解发展畜牧业对粮食的需求，又能改善生态环境，还能增加农民收入。生产的“桑粕”可替代“豆粕”，减少大豆进口。桑桉能开发出多种药食同源产品，是一项具有经济效益的成果，受到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等几位院士的充分肯定与积极支持，认为这是一项有关发展木本饲料的创举。目前已在全国试种，面积达 100 多万亩，需要大力支持。

四、石老询问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孙鸿良研究员引进培育的籽粒苋进展情况。她先后引进与培育出 7 个品种，在各地试种的有 5 个品种，曾受到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高度赞赏，可在沙荒地、干旱地、脊贫地种植。最近来自新疆与山西的消息，在天山南北的戈壁滩与平朔煤矿的矿区，种植红穗籽粒苋，每亩鲜草产量达 8 吨，能养 5 头猪，如烘干后可运往外地使用。由于蛋白质含量高，食口性强，猪牛羊与鸡鸭鹅都喜欢吃。其叶可作人们蔬菜食用，籽粒可作粮食或糖品食用，以及酿酒等。由于植株高，又有鲜红的穗，可成为十分美丽的观赏景观。据他们研究，其营养价值超过豆粕与苜蓿，能开发出多种有效益的产品。全国矿区拥有土地 4800 万亩，这是一个很大的农业资源，发展潜力甚大。

五、石老介绍说，在河北省廊坊市有一位晏国生，创办了思科农业公司。利用鬼子姜（学名菊芋）可用于盐碱地种植，经过两年时间，可使土壤中的盐碱消失。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科技成果，可作详细了解。我国拥有盐碱地 5 亿亩，包括内陆。盐碱地与滨海盐碱地两类，通常采取灌水洗碱的办法，改变土壤，而用生物办法治盐碱是个方向。石老还说到海水淡化技术是很成熟的，应引起重视，作出规划，使其变为良田。

六、石老反复说，应把着眼点与着力点，放在 100 亿亩土地上，不要只在 18 亿亩耕地上做文章。要把 40 亿亩草地与 40 亿亩林地作为开发重点。汉武帝从西域引进苜蓿草，开创了发展草业与畜牧业的先河，钱学森提出第六产业，把沙业与草业作为重点，要研究如何落实。

七、石老说，贵州是最穷的一个省，那里没有多少土地，不知如何才能致富，只靠一个茅台酒恐怕不行。

贵州是闻名天下的穷省，在池必卿任省委书记时，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为了包干到户，与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发生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激烈争论。在朱厚泽任省委书记时，为了调入口粮问题，与其他省的领导发生了激烈争论，证明解决贵州贫困问题难度甚大。现在茅台酒已成为贵州改变贫困面貌的最大品牌，成为价格昂贵的珍藏品（每瓶近 4000 元）。但只靠茅台还是很不够的。最近几年，贵州利用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发展有特色的产业，变化很大。六盘水号称“凉都”（夏无酷暑，冬无寒冷），举办国际性活动，同时开发红心猕猴桃 20 万亩，刺梨 110 万亩，春茶 31 万亩，上市交易，效益可观。在西北的宁夏有个六盘山，也是最穷的地方，石老曾在此做过调查，写过林草致富的文章，现在也有很大的变化。两个六盘山，一个是云贵高原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一个是黄土高原的荒漠化地区，人的观念变了，贫穷的面貌跟着变了，事在人为。

八、人们常问石老长寿之道，他说三句话：能吃、能睡、能骂人，敢于直言。他主张“林草兴邦”，发展草原，曾受到原农业部长沙风的批评，不抓大事（粮食），只种草能解决吃饭问题吗？他直言不讳，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母亲河大出血”，每年流入海里的沙土达 16 亿吨之多，种草养畜是最有效的办法，后沙风部长表示赞同，在“文革”中，农口分作两大派，石老说沙风是“和稀泥的”，不介入派性斗争，对此表示赞赏。学界称主张发展林草业的有“三石”（石山，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林业科学院研究员石玉林）。在万寿路部级干部住所有三位年过 90 的老人，叫“玉、安、石”同时去买菜，前两位有的已去世，有的出不来了，剩下的只有石老。

石老最后叮咛，一定要把《通讯》办好，为大家提供一个建言献策的平台，很有意义，历经 20 多年不容易，要坚持下去。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9 年 10 月 31 日）

从全球大背景看我国“三农”发展走向

叶兴庆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 叶兴庆

采访人：农民日报记者 余瑶

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记者：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应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叶兴庆：比较优势既要从国内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来看，也要从全球范围的比较来看。这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原来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其不利的一面在逐步显现，导致农业发展面临国内外成本和价格倒挂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发挥小规模农业的比较优势。要把农业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特色农产品、鲜活农产品生产上，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要通过产业链的改造和农业多种功能的释放，重新构造农业的竞争优势；要从产量导向转向品质导向，通过品质的提高和优化来弥补成本上不利的一面，让消费者愿意为国产优质农产品付更高价格，以高价格覆盖高成本，以高品质支撑高价格。这样才能让小规模农业有生存的空间，这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记者：当前绿色发展方式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您如何看待我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关系？

叶兴庆：过去在追求增产的压力下，我们采取了各种手段，甚至是不计代价来提高产量，这个代价包括过度消耗资源、透支生态环境。经过 7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几个大的台阶，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变化，老百姓从要求吃饱变为要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营养，需求的变化对农业发展的理念带来新的要求。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一方面要靠政府用“有形之手”来撬动。退耕还林、化肥农药减量、畜牧业和水产养殖的布局调整等，都是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对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让按照绿色生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市场认可。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品牌的培育、营销模式的改造、可追溯体系的运用等。还有就是通过科技评价体系的改变来引导科技创新方向和创新重点的转变。以前评价科技成果水平高低主要看增产多少，今后要注意看资源节约的程度、对环境的友好程度。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多维度采取措施形成一个政策组合，实行新的政策组合才能够实现新的发展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记者：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格局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应对这种变化？

叶兴庆：“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应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构想。目前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集中度比较高，主要农产品前 5 位进口来源国在总进口量中所占比重普遍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我们国家是 14 亿人口的大国，体量大，未来农产品进口还会不断增长。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进口来源多元化分散风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不少是农业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而且一些具有潜力和优势的产品恰恰是我们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从战略上在沿线国家培育更多的农产品来源地，这对我们国家和沿线国家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记者：您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叶兴庆：中美贸易中，在工业品上我们存在顺差，在农产品上我们存在逆差。所以在前一阶段的中美贸易战中，我们更多的是把对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加征关税作为一种反制手段。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或者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不能够得到消除，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重要农产品贸易格局，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大豆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肯定会下降。我相信美国人认识到了如果不结束贸易战全球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格局将会重构这一点。

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方将按市场原则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这有利于满足国内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对国内相关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还要看到，这也有利于发挥农业在维系中美经贸关系中“锚”的作用。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作用

记者：您曾多次提出我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需要进行改革，以往的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近些年来进行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等尝试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叶兴庆：2004 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是重构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起始年份。2004 年开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后粮食连年增产。但是随着最低收购价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比如价格倒挂，再比如支持制度本身是否符合 WTO 规则也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大概经过 10 年的运行，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一套支持政策有问题。所以从 2014 年开始我国对这套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改革。

2014 年又是一个节点性的年份。这一年对新疆的棉花和东北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试点，随后取消了油菜籽和食糖的临时收储。从 2016 年开始，玉米取消临时收储，实行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第一轮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结束以后，2017 年开始，棉花实行第二轮的目标价格补贴，大豆跟玉米一样，实行生产者补贴加市场化收购。

现在来看，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仍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无论是进一步完

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还是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我们都必须考虑到 WTO 规则的合规性问题。2019 年上半年，世贸组织发布了专家组和争端解决机构的两份报告，一个是认为我们对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的操作办法导致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超过了 8.5% 的上限；另外一个报告裁定认为中国对农产品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特别是在国营贸易上的管理办法，跟中国当年加入 WTO 时的承诺存在一些偏差。

未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调整完善，要向着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入市承诺、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向发展，主要政策取向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农产品特别是稻谷、小麦作为口粮，要保证它的供应，保障它的安全，政府支持政策也不能缺位。

其实，根据世贸组织《农业协定》关于“绿箱”措施的规定，有大量的措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下一步要充分利用。至于“黄箱”措施，要有效利用非特定产品 8.5% 的空间。比如，按照 10 万亿元的农产品产值计算，8.5% 的非特定产品“黄箱”空间就是 8500 亿元，这个空间我们用得还很少。所以即便是按照 WTO 的规则来做，农业的支持空间仍然很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新的农业支持政策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是大有可为的。

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的发展趋势

记者：70 年来，我国乡村治理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您认为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迎来哪些新变化？有哪些挑战呢？

叶兴庆：这些年在乡村治理上我们一直是在探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在县下的乡村建立新的治理体制，通俗地叫“乡政村治”。这套治理体制经过 20 多年的运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但是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乡政村治”这套治理体制内在的缺陷逐步暴露。一是乡村的人口构成在变；二是治理的事项发生了变化。以前要收统购粮，实行计划生育，农村有些基本的公共设施要靠农民摊派。现在，农村需要治理的事项变了，比如环境问题、集体资产问题、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以后的所有权问题等。

因为人在变、治理的事项在变，乡村治理的机制也应该变，所以十九大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仍然要发挥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整个国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乡村事务里面大量的事情，特别涉及财产权利的问题，更多要靠现有的法律来维护执行，不能简单地实行自治。不过自治和法治都是有成本的，德治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大家在一个村的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里，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么矛盾纠纷的概率就会降下来。所以未来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自治、法治、德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边界。

记者：法治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叶兴庆：第一是要普法。一部分地方、一部分农民群体法的意识还比较淡薄。所以强化法治的观念、理念，普及法律常识，是实现乡村法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是为乡村提供公益性的法律援助。很多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会也不善于用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需要思考公益性的法律援助体系如何广泛地深入乡村，为农民提供司法援助。

归根结底，乡村治理要实现法治，必须要有法可依，这就要求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现有涉农法律不断修订和完善，使法符合社会现实。同时根据乡村振兴的需要，一些重要的法律空白点要尽快补上。比如说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一些基本的法律，不能长期缺位。

记者：解决农村问题，关键在于促进城乡融合，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如何能做到这个“融”字？

叶兴庆：到十六大我们党在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面有两个首次，第一是在党的文献里首次承认我们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二个是首次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把城和乡统筹考虑。

到十七大和十八大，我们在城乡关系的认识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不仅仅是城乡统筹，而且是城乡一体化。十九大明确提出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次把城乡融合发展放到这么高的位置，是因为未来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拦路虎和难关。

有哪些东西在阻碍乡村振兴？毫无疑问，是城乡二元结构。除此之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的系统性衰落是有它内在的规律的。但是我们又不希望乡村系统性衰落，我们希望乡村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振兴起来。那就是把城和乡作为两个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优势的空间单元，把它打通，让两个单元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那就是融合。具体来讲，又可以体现在四个维度。

首先是产业。发展乡村产业，不能就乡村谈乡村产业。因为乡村、农业、农业以外的多元经济，它们的市场在城市。所以未来乡村产业的发展要跟城市的需求融合、有机互动，这是产业层面的城乡融合。

第二是要素。人、地、钱，怎么样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进城，城市里面优质的教师、科技人员怎么下乡，城市里面的养老需求、观光需求，怎么能够在农村落地？

第三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正在推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体系怎么对接、怎么打通？打个比方，农村的人进城以后，怎么能够享受城市里面的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城里人下乡以后，在农村长期生活居住，他需要的医保和社会保障怎么能够跟人一起流动？

第四个是生态。城和乡是在同一个生态体系里面，应在生态上共建共享。乡村更多地发挥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功能，城市作为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消费者、受益者，要促进乡村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供给。城市的产业如果下乡，也要注意不能出现污染转移下乡，因为城乡最终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十九大提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说明未来的乡村振兴一定要按照融合的思路，谋划具体行动。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

新型城镇化要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

王琳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 21 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大事”。改革开放 40 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 40 年，更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 40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城镇化研究 40 年暨吴友仁先生诞辰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城镇化建设与发展展开讨论。

中国城镇化研究四十年：城市化的本质是现代化

上世纪 70 年代，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吴友仁教授在文章中写到：“世界上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城市化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城市群的过程。”“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不高，但也出现了一些城镇群的萌芽，如辽南（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等城镇群、宁沪铁路沿线的城镇群（南京—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株洲—湘潭—长沙，以及广州—佛山—江门城镇群。它们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这可能是城市化的一种必然现象。”

“这两段话明确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也前瞻性地提出城市群（都市群）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翟国方说。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周义安指出，“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首开中国城镇化研究的先河。他在文章中定义了城市化的概念，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了我国城乡面貌的巨变，并预测了本世纪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后续中国本土城镇化研究打下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果。”

随着新情况、新问题出现，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将会怎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何兴华认为，“目前，城镇化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增长与收缩并存，要将乡村振兴纳入城镇化研究的范畴，弱化与户籍挂钩的政策。城镇化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的根本性改变，在中国，要从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传统社会发展成现代社会，推动农民转变成公民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耕种从农业进入市场，需要各种要素的参与重组，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原有的解释框架也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认为，未来在现有城镇化当中要坚持三个导向，第一，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作为根本的目标。现代化不一定只是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实现。第二，城乡融合应该是我们的基本语境。第三，以生态文明为基本底线。

城镇化发展：县（市）域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

周义安表示，“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 50%，是国家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几百年的路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研究也取得了迅猛发展，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关注。”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城镇化发展过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县（市）域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空间规划体系不健全、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等。

李晓江指出了几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城镇化发展认识和行政行为存在偏差，即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发现规划行业、地理行业研究城镇化秉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但是许多经济部门在研究城镇化的时候偏于功利，把城镇化作为一种经济增长因素，或者是寻找投资的方向、促进增速的思路。所以，行政层面关于城镇化的认识和推进比学术界对城镇化的研究要晚 20 年。第二，县（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地方精英外流非常严重。第三，经济发展动力不充分。”

总结美法德日等国际发展经验，李晓江表示，“缩小地区、层级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比缩小城镇化率差距重要。用多种政策推进欠发达地区现代化，是促进健康城镇化的有效途径。”

进入新阶段，要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随着老龄化与人口抚养压力剧增，就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群体扩大、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等，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李晓江指出，当下城镇化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未来人口城镇化将长期保持在 70% 左右。此外，人口向大城市和县级单元集聚的态势不断强化，县（市）域城镇化地位不断提升等也是新的发展趋势。

从 1988 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以来，尤其是 1990 年代后期到现在的 30 多年，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条以土地城镇化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田莉认为，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长期制约城乡可持续发展的二元土地制度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要从依赖土地财政工业开发区建设的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这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人口流入城市，大量靠近城市的集体建设用地成为重要的战略性土地资源，同时也为这些城市未来住房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未来推动集体土地改革与租赁住房供应联动，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忽视的流动人口住房问题，而且以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为突破口，也为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机制，实现城乡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田莉说，“推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要从依赖土地财政、工业开发区建设与新城区地产开发的‘土地城镇化’模式转向以流动人口定居、安居为导向的‘人口城镇化’研究。”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责任编辑：田春玲）

从“家庭农场”到“农民合作”：恰亚诺夫的合作化思想 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潘 璐

【内容提要】农民经济理论和农民合作社理论是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恰亚诺夫以家庭农场研究为基础，关注如何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大生产，提出了以合作社为载体的纵向一体化，构建了“小农场+合作社+支持型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本文通过介绍和补充恰亚诺夫关于农民合作社的研究论述与主要观点，强调指出了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国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 农民合作社, 纵向一体化

一、恰亚诺夫的“热潮”与“冷遇”

在中国，从事农业转型与农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鲜有人未曾听闻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未曾知晓他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的主要观点。亚历山大·恰亚诺夫（1888—1939）是苏联经济学家，“组织-生产”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他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和知晓主要源自其著作《农民经济组织》中文版的翻译和引入。《农民经济组织》是恰亚诺夫写于20世纪20年代，论述俄国农民家庭农场的一本著作。该书于1923年首次以德文版出版，1925年俄文版出版，从德文校译的日文版和从俄文校译的日文版分别于1927年和1957年出版，1966年与恰亚诺夫的另一篇早期论文作为合集出版了英译版，1967年后有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译本相继出版（秦晖，1996）。1996年，该书的中译版由萧正洪译出，作为秦晖编撰的《农民学丛书》的其中一本，恰亚诺夫逐渐为中国读者了解和认识。在西方知识界，《农民经济组织》一书的广泛译介和恰亚诺夫思想的广泛传播，形成了一股“恰亚诺夫热”，它从英语世界蔓延到全球，从农业经济学蔓延到其他学科领域，直到21世纪，仍有方兴未艾之势（秦晖，1996；侯建新，1999）。

三十多年来，国内学者一直不乏对恰亚诺夫的解读和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关于恰亚诺夫的学术论文集中于对恰亚诺夫本人的著作、思想及其时代背景的介绍，例如秦晖、金雁、谷树忠、徐建青等人的文章。由于当时恰亚诺夫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较为有限，因此并没有涌现出大量的思想讨论和学术文章。随后，一些学术文章在党史研究和马列思想研究中引用恰亚诺夫的相关著述，旨在分析厘清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政策背景，回顾引证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农民发展的论述（刘长江，2006；王道勇，2009）。过去十年来，随着中国农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围绕恰亚诺夫展开的对话、讨论和应用也有渐强之势。这些学术对话不再以介绍恰亚诺夫思想为目的，而是将他跟农业与农民研究中的其他（经典与当代）思想名家并列，辨析各自的理论框架和变迁主张，对其进行反驳或再诠释，用以论证作者自身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观点。在这些学术对话中，作为农民研究中的“三大传统”之一，恰亚诺夫通常与马克思和列宁、舒尔茨形成思想观点上的对照（黄宗智，2014）。

从介绍、传播到应用、对话，恰亚诺夫思想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这些引用和讨论中往往存在一种对恰亚诺夫观点进行简化和贴标签的倾向，存在过度解读乃至误读。当代最活跃的恰亚诺夫思想的传播者，农村社会学家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将恰亚诺夫的学术境遇比作“三次死亡”：继 20 世纪 30 年代遭遇政治迫害之后，由于苏联科学研究受到政治制约，恰亚诺夫的学术声誉在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依然未获得认可；在恰亚诺夫名誉得到恢复之后，他又被迅速“偶像化”成为“挂在墙上的摆设”，谈论恰亚诺夫成为一种时尚，他的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应用。当恰亚诺夫在发展研究文献中被提到时，通常被视为“小而美”观点的代言人和小农户的捍卫者，成为资本主义进步理念和国家干预主义共同抨击的目标。事实上，恰亚诺夫并不是“小”与“大”之间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所反对的是“大的是美好的”现代化线性思维，在农业发展中倡导“混合的才是美好的”这一发展理念（Shanin, 2009）。中国学界也不乏对恰亚诺夫的某种简化式理解，已有的学术讨论普遍认为恰亚诺夫立场下的小农生产具有超越历史条件的绝对稳定性（许惠娇、叶敬忠，2017），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隔绝的理想化形态（郑杭生、汪雁，2005；熊春文，2017；黄宗智，2014：8），他的农户理论只解释微观层面农户具体的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忽视和回避了宏观层面的小农发展问题，是孤立、静止的极端个体主义的研究取向（王道勇，2009）。由于被视为对前现代社会小农微观行为的浪漫化与理想化，在农业转型的当代讨论中，恰亚诺夫的学术思想往往被视为过时的，不具有解释力的（熊春文，2017），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不具有现实理论意义。

对于多年后读者的评论与质疑，恰亚诺夫早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的序言中就已经有过部分回应和澄清。作为农业经济学家，他既充分认识到了小农家庭农场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多样的联系方式，也反对当时的苏联学者对他进行的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抨击。相反，他是立足于当下小农家庭农场的实践形式来构建未来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村的萌芽，是通过对小农农场内部机制的分析来探寻它们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能形式（恰亚诺夫，1996：11-17）。事实上，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提出本身就贯穿在他对俄国农业发展的宏观构想之中。由于对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缺少全面而深入的阅读和了解，当代读者对他的理解往往偏之一隅。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是恰亚诺夫理论思想的另一支柱，它们共同构成了恰亚诺夫“小农场+合作社+支持型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然而，在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英译本于 1966 年问世之后，时隔多年，他的另一著作《农民合作社理论》（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的英译本才于 1991 年问世，其影响力远不及前者（Bernstein, 2009）。农民合作社理论融合了恰亚诺夫对家庭农场和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思考，弥合了小农场主体和大生产之间的实践跨越。通过介绍和补充恰亚诺夫关于“农民合作”的观点，我们将看到他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国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二、俄国合作化运动与恰亚诺夫的合作社研究之路

俄国在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之际已经发展形成了高涨的合作社运动，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在世界上均位居前列。19 世纪 60 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之后，私营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地方自治机构开始建立，合作社作为促进社会民主改革，减轻农奴赤贫现象的工具开始逐渐萌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自 1905 年起，合作社在俄国开始快速发展和普及。在 1902 年年初，俄国已经有 1625 个注册的合作社组织，1912 年增加到了 18023 个，1915 年增加到了 35200 个，容纳了 1100 多万个农户，这意味着俄国人口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受到了合作社运动的影响（Danilov, 1991：xi）。至 1917 年全俄共有 63000 个合作社，成员数高达 2440 万人。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农村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战场，合作社已成为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小农户提供了融入市场经济的机会，对于小农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广翔、袁丽丽，2010）。

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恰亚诺夫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合作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的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后改为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Timiryazev Agricultural Academy]）读书期间，恰亚诺夫曾于1908年和1909年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度假，对两国的合作社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1909年，恰亚诺夫以《意大利农业合作制》（Co-operation in Italian Agriculture）为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分析了合作社在20世纪初的农业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合作社不仅能够帮助小农抵御私有资本，尤其是放高利贷者和中间商的剥夺，还能够创造一种经济机制，帮助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环境，实现整体性的发展。在他1909年发表的《比利时乡村信札》（“Letters from the Belgian Countryside”）一文中，他解释了农民合作的重要意义，即“在不对经济均衡进行特殊改变、不对小规模农村经济的组织计划进行根本性破坏的情况下，使乡村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够享有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优势”（Danilov, 1991: xxi）。恰亚诺夫在1911年2月从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毕业之后立刻开始对合作社的研究（Bourgholtzer, 1999: 4）。在1914年之前，恰亚诺夫就和当时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第一代合作社专家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h）在莫斯科的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Shanyavskii People's University）成立了一个系，专门对合作社进行研究，这个系很快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智库中心。1915年，恰亚诺夫出版了《合作化简明教程》（Short Course on Co-operation），这本书在1915年—1925年间再版了三次，在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Danilov, 1991: xxv）。恰亚诺夫还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具体组织工作。1914年，他倡议组织成立了亚麻出口合作社。当时俄国是世界最主要的亚麻出口国，1916年至1917年期间，亚麻生产者合作协会（the Cent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 Flax Growers）占据了俄国亚麻出口的垄断地位，而恰亚诺夫正是时任协会理事长（Durlauf and Blume, 1987）。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恰亚诺夫的农业经济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十月革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机会，也让恰亚诺夫看到了俄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的希望。恰亚诺夫合作社理论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纲领，无不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影响。他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民主改革，1917年4月他作为农业改革联盟的发起者之一开始推动对俄国农政问题的讨论，并以《土地问题何在？》（What is the Agrarian Question?）为题写了一本册子。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面临着如何在小农个体生产占据主体地位的农村地区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恰亚诺夫认为，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的小农农业和乡村社会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变革与升级。他坚信，合作社的集体化是将大规模经济、工业化和国家计划的要素引入小农经济的唯一可行方式（Danilov, 1991: xxxiii）。他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 and 回答集中浓缩在其1919年出版的著作《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思想与组织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中。这本书是恰亚诺夫十余年合作社研究的结晶，该书在1927年以《农民合作社理论》为题进行了再版，并进行了大量修改和补充。

三、家庭农场的组织优势与规模局限

恰亚诺夫的合作社理论是以小规模的家庭农业为基础的。从恰亚诺夫的理论形成过程来看，农民农场组织的理论基础问题正是在他参与农业咨询工作和合作社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关于农民农场组织问题的大量经验材料日益积累起来……且无法用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个体经济企业组织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解释”（恰亚诺夫，1996：5）。因此他将农民农场称作家庭劳动农场以区别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提出解释农民农场的独特组织理论。在农民的家庭农场中，家庭劳动是认识农民农场组织的根本性质的基础，家庭经过全年劳动获得单一的劳动收入（family labour product），并且通过与所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比较来对劳动的耗费做出评价。这种家庭不雇佣家庭外劳动力，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供利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

并且有时不得不将其一部分劳动力用于非农业经济活动，如商业和手工业。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恰亚诺夫围绕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个主要要素的组织方式论述了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差异。

（一）土地的使用

在乡村手工业、商业和畜牧业发展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恰亚诺夫以土地播种面积作为衡量家庭经济活动量的主要指标，正是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与下限。家庭经济活动能否达到最大规模，取决于家庭劳动力能否以最大强度和最高利用率提供劳动量，农场经济活动规模的下限则取决于家庭维持生存所绝对必需的物质利益的数量。由于家庭的规模与构成会随家庭生命周期而变化，这使得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即土地耕种面积）在村社土地制度弹性较大的情况下呈现出波动起伏。由此，恰亚诺夫提出了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对农场经营规模变动的“人口分化”的理论解释。“人口分化”的提出并非否定社会分化，“这并不是说我们正在放弃使用‘社会分化’的概念，社会分化在农村是相当普遍的存在着”（恰亚诺夫，1996：38），而是对除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无产阶级之外的广大俄国“中农”群体中存在的多元分化给出一种解释。与之相对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经营规模则是由资本量和土地面积决定的，相对固定的不变资本决定了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经营规模是稳定不变的。

（二）劳动的投入

恰亚诺夫看到，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农民农场在劳动的使用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源自不同农场的家庭结构。家庭内部结构和地区的生产条件决定了家庭农场中劳动量的水平，在一个地区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劳动量的使用就取决于家庭的消费需求。农民受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当消费需求出现增长，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耗费又受到劳动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约。由此，恰亚诺夫提出“劳动辛苦-效用平衡”，来解释农民劳动投入背后存在的逻辑关系与心理过程。资本主义企业是以总收入减去原材料费用和工资之后得到的纯利润值来判断生产劳动是否有利可图，是否要继续投入劳动。与之相对，家庭农场中没有工资的概念。在不利的市场条件下，农民农场具有比资本主义农场更强的生命力，因为农民劳动农场为满足家庭需求可以接受更低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辛苦程度。

（三）资本的形成

家庭农场总收入在资本形成和劳动力补偿之间进行的划分有其独特的逻辑。资本主义企业的总收入在补偿预付资本之后，将剩余价值用来扩大再生产。与之相对，家庭农场的资本补偿与积累是同生活需求的满足相联系的，农场收入的划分依据的是生产与消费主观评价的均衡，或者更准确地说，依据的是一种维持稳定的福利水平的愿望（恰亚诺夫，1996：213）。在任何情况下，资本积累的数量都取决于生活需求满足的程度。在生活消费水平很低时，资本积累的过程，甚至仅仅是资本补偿的过程，都不可能明显发生。在尚有大量基本需求未被满足之时，人们不可能限制消费，也不可能显著地增加资本积累（恰亚诺夫，1996：194）。只有在满足家庭消费需求，补偿预付资本后仍有剩余，家庭才将剩余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只有既可以减少劳动辛苦程度又可以提高需求满足程度的资本投资才是可接受的。

在对农民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之后，恰亚诺夫以“劳动-消费平衡”概括了家庭农场组织计划中蕴含的核心原则。包括农民农场在内的任何经济单位，都是追逐利益的经营组织，都是一种以获取最大收入为目标的企业（恰亚诺夫，1996：99）。农民家庭在组织生产之初，便企图能够使其需求尽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为达到这一目的，农民家庭竭力做到用尽可能获得最高单位劳动报酬的方式来使用自己

的劳动（恰亚诺夫，1996：100）。这使得农民家庭不得不在缺少足够的土地和资本的情况下组织劳动生产，努力使各生产要素之间达到一种一致而和谐的比例，实现符合自身实际的差异化的最优规模，这也使得现实中俄国乡村的农民家庭农场呈现出组织计划上的多样性。

然而，对农民家庭农场微观组织机制的剖析并非恰亚诺夫理论分析的终点，他的终极关怀在于俄国农业的发展。如其所言，“要认识个体经济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要弄明白总的经济过程本身，我们必须充分阐明单个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然而，脱离一般的国民经济分析，我们便不能充分理解单个的个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恰亚诺夫，1996：100）。彼时俄国农业面临的一系列环境变化包括：第一，大规模组织方式是所有经济活动根本的组织理念（Chayanov, 1991：1）；第二，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农业正日益地被卷入世界经济的总流通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使农业日益处于依附地位（恰亚诺夫，1996：257）；第三，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发展较为迟滞，且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不如在工业中显著。但是，小农经济在农业生产组织中展现出的生存能力本身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Chayanov, 1991：3-5）；第四，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尽管较少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横向集中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企业组织形式，但在经济关系上，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有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尽管还具有小商品生产者分散而独立的性质，却通过市场被纳入按资本主义方式聚集而成的经济体系之中，并受到金融资本主义最高组织形式的控制。这种资本主义的“纵向一体化”在当时是比农民的无产化更显著的经济变化。对于资本家来说，纵向一体化所产生的利润要大于横向的生产集中，还可以将很大一部分经营风险从资本家那里转嫁给农民（恰亚诺夫，1996：257，263）。

除了俄国农业面临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小农经济自身也与国家发展之间存在内部张力。恰亚诺夫看到，“俄国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形成的一种自发力量，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如果我们不希望动摇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弹性机制，那么就不能听任国民经济的一个最主要部门的发展处于某种自发的状态。……我们必须致力于对自发的农民农场进行直接的组织控制”（恰亚诺夫，1996：265-266）。因此，以大量农民家庭农场为基础的俄国农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小农经济的宏观组织问题：小农经济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突破个体农场的规模限制，纳入国民经济总体体系之中并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农业纵向集中相抗衡？小农经济是否需要纵向集中，如果需要，应该以怎样的形式组织？（Chayanov, 1991：20）。恰亚诺夫对于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便是农民合作社。

四、农民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的规模生产

恰亚诺夫对于以合作社作为农业理想组织形式的论述是从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组织方式两方面入手的。恰亚诺夫的现实关怀并未停留在小规模的小农户生产本身，他关注的是如何在保全小农户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大生产，“毫无疑问，在农业和工业当中，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极为可观的优势，能够降低生产成本”（Chayanov, 1991：3）。横向集中(horizontal concentration)和纵向集中(vertical concentration)是实现规模化生产的两种常见的组织方式。从当时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来看，横向集中的方式面临很大的制约。“在工业中，集中和扩大生产规模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将很多小规模、在地理分布上分散的企业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上合并成一个巨型企业，从而将很多人力和机械集中到一个较小的空间中，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在农业中，要实现这样的横向集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农业就其本质来说必然与广阔的地域相联系，一个农业企业的规模越大，它就必须占用更大的面积。这意味着它不可能在空间上实现集中。……农户规模越大，它耕作的土地面积就越大……农产品的数量越大、运输的距离就越远，交通成本就会增加。

农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获得的收益就会被增加的交通成本抵消”。（Chayanov, 1991: 3-4）

正因如此，当时的俄国农业并未出现大量的大规模农业企业。如恰亚诺夫所看到的，“几乎在每个地区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与纯粹的劳动农场相伴随的还有资本主义的农场形式。在俄国，这种形式的农场尚未成席卷之势”（恰亚诺夫，1996: 255），“（农民自发的横向一体化）这一过程的规模相当可观，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一种巨大的规模，以致可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一体化政策的全部基础”（恰亚诺夫，1996: 267-268）。以农民自发分化而形成大规模农场，进而被国有化为大型农业企业，这样的发展路径在当时的俄国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苏联农村政策的背景下，在1924年土地法案实施、土地国有化之后，这种路径是不可想象的。小农阶级的无产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苏联政策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我们不仅无法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成大规模生产单元，还不得不把以往的大地产分成小块。……在当前阶段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横向集中形式就是将小农的土地以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的形式集中成为大规模生产单元，例如农业公社，或者土地共耕协会等形式。这一过程正在大面积铺开，但是它的发展规模并不能达到农业生产集中所需要的程度”（Chayanov, 1991: 21）。

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实现小农户的规模化生产唯有依靠纵向集中的方式。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用纵向集中的方式来控制农业了。“近来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已经表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必然采取以资本主义生产线、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企业的形式。农业是从属于商业资本主义，通过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结进行控制……农村资本主义开始渗透到生产过程之中，将某些生产环节从小农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Chayanov, 1991: 6）。俄国农民，乃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被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本身就体现了资本主义流通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中引发的深刻影响。在恰亚诺夫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纵向集中产生的后果是将农民变成了附属于资本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他们承担了被资本家转嫁的生产风险，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性，面临着从半无产化沦为无产化的境地（Chayanov, 1991: 7），“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具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恰亚诺夫，1996: 270）。因此，他坚定而明确地提出，“实现小农户集中化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纵向集中，它必须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因为只有以合作社的形式才能与农业生产有机衔接。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要将规模经济、工业化和国家计划的要素引入小农经济之中，只有通过合作社集体化的方式（co-operative collectivization），逐步地、渐进地将产业化生产的特定环节从单个农户中剥离出来，并将其组成公共企业”（Chayanov, 1991: 21），“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劳动农场通过合作组织形式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能够抵御大型资本主义的农场，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恰亚诺夫，1996: 256）。

恰亚诺夫在《农业合作的基本思想与组织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一书中将农民合作社界定为“农民经济的一部分，从农民经济中剥离出来以便按照大规模的原则进行组织”。只有农民经济存在，合作社才会存在（Danilov, 1991: xxxi）。为了使合作社能够实现规模效益，恰亚诺夫首先区分了农业生产不同环节中存在的差异化的最优规模。他将农业生产的主要技术过程分为四部分：第一，机械过程（包括耕地、播种、交通、收割、牲畜运输等）；第二，作物生长和牲畜养活的生物过程；第三，原材料深加工的机械过程（例如制作黄油、亚麻等）；第四，将农户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经济过程（买卖、销售、获得贷款等）。从技术角度来看，有些活动更适合大规模组织（如原材料深加工的机械过程），有些更适合小规模农场（如生物过程）（Chayanov, 1991: 46）。农业生产的不同种类在不同环节上所需要的最优规模也有所不同，例如奶业合作社的运营是在2英里—3.3英里的半径范围内，甜菜和

土豆合作社的运营是在 6.6 公里的范围内（Chayanov, 1991: 208）。这意味着一个企业整体的最优规模和每个生产环节的最优规模是有区别的，为了实现农业中经济组织的最优化，就需要打破企业的整体性，将一个农业企业的组织计划分解成基本的组成要素（Chayanov, 1991: 46）。因此，“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就成了农业合作的基础性组织理念，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将这一理论付诸现实。正是由于在技术上有可能将组织计划分解成单个的要素，小农农户才能将那些在机械和经济层面需要较大最优规模的生产环节分离出去，和其他同类型的小农户一道，将这些环节以合作社的形式在更大规模上来运转。那些最优规模没有超出小农户家庭规模的生产活动则继续由家庭来负责（Chayanov, 1991: 47）。合作社是将那些在大规模生产形式上具有优势的经济活动集体化，同时把那些以小规模形式组织更好的部分留给单个家庭农场，并不是农业的所有环节都进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中。合作社的组织是在很宽泛的范畴中运行的，但它始终遵守一个界限，那就是家庭农场的参与基础。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小农家庭能够在获得经济稳定性的同时在经济和技术上变得更强健（Chayanov, 1991: 207）。

五、合作社的理念基础：小农户的主体性

恰亚诺夫所构想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将小农家庭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其成为在技术上具有先进性同时又免于被地主阶级和资本积累剥夺的农业生产组织（Bourgholtzer, 1999: 16）。合作社的构成、运行和发展无不体现出以小农户为主体和基础的特色，这些理念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面向小商品生产者的组织构成

现代的合作社体系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合作社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运行，其组织构成面向的是嵌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最大多数的小商品生产者。恰亚诺夫通过引用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25 年的农户分化研究勾勒了合作社服务的对象群体。这项研究将当时的俄国农户分为六类：第一，传统的富农（kulak）家庭；第二，在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中大量使用雇工的半资本主义式农户；第三，既不使用雇工也不遭受其他资本主义剥削，主要通过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农户；第四，既不使用雇工，也不被别人雇佣，但是由于缺少生产资料、土地和工具，可能成为富农的剥削对象的农户；第五，由于缺少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经常需要向第二类农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户；第六，无产化的农户，主要收入来自出卖劳动力（Chayanov, 1991: 26）。在这六类农户当中，富农因其剥削性的盈利方式，无产化农户因其在生产资料上的绝对匮乏而无法纳入合作机制，其他四类农户均在合作社的成员范畴中。合作社也因此成为面向大多数俄国农户的组织机制。在这些农户当中，合作社的社会基础又特别地依赖两种类型的农户：以或多或少使用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户家庭（恰亚诺夫称之为市场导向的资本化农场[capitalist market-oriented farms]）和通过使用家庭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使用雇佣工人获得主要收益的农户家庭（即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market-oriented family households]）（Chayanov, 1991: 31）。或者说，恰亚诺夫所分析的农民家庭劳动农场即是合作社的构成和服务主体。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以家庭自有劳动或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家庭农业依然是小农户经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成为市场经济机制下合作社组织的根基。

（二）以农户利益为先的经济核算

合作社组织是由追求自己利益的小农农场组成的，合作社对成员农民负责。合作社存在的目标就是提高每个成员的生产率和收入，减轻每个成员个体在生产和家庭管理中的负担与成本，从长远来看使其免受中间商、销售商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取代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合作社组织不应有自己单独的经济意图

（Chayanov, 1991: 248）。合作社的规模不是由可用资本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联合起来的农户的需求决定的。合作社的结构和盈利既不是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的，也不是由合作社机构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而是由农户的利益以及农户通过合作社所获得的劳动收入决定的（Chayanov, 1991: 47）。一个合作社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没有盈利，但是提高了成员的收入，它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合作社的成功是以成员收入的增加来衡量的，不是由合作社自身的利润来衡量的（Chayanov, 1991: 48）。

（三）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发展愿景

农民家庭农场的主体地位是恰亚诺夫区别于其他合作社理论家的关键，也是他与斯大林产生政治分歧的原因所在。如他所言，“很多合作社理论家认为，我们所解释的这些合作社的形式最终将逐渐走向所有农业生产过程的完全社会化，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化企业，而单个的家庭农场将完全消解。这种想法尤其在十月革命之后非常普遍”（Chayanov, 1991: 207）。针对这一点，恰亚诺夫澄清道，“将某些特定活动从小农家庭组织计划中剥离，融入到大规模企业中，这首要地代表的是众多小规模家庭农场，而不是某一个事物的发展阶段，是对一种原则和理念的体现”（Chayanov, 1991: 208）。

恰亚诺夫将自己的农业发展模式称为合作社集体化（co-operative collectivization），以区别于斯大林的集体化。他认同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目标，但认为完全集体化的做法是错误的，从农业生产规模的角度来说，完全的集体化公社是无法实现不同经济活动的规模效率的。邓大才将恰亚诺夫的“纵向一体化论”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改造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总结：从改造的基础来看，前者是建立在家庭或者农民农场基础上的合作，后者是在消灭家庭或者农场的基础上的吞并；从改造规模来看，前者不强求规模效益，后者则追求规模效益；从改造时间来看，前者主张利用市场和农民的自愿，自然渐进地形成，后者主张国家引导和干预，加速行政推进；从所有制来看，前者不强求公有制，后者要求将小农改造成公有制甚至国有化（邓大才，2013）。在恰亚诺夫看来，实现农业转型的路径应是小农户自下而上的多元合作，是大规模和小规模生产单元的灵活组合，是与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差异化最优规模。同时，集体化和农业合作社也并非完全不相容，它们不应该相互取代，而应该相互补充。“在建筑、存储和畜力的使用等方面，集体农场的经营规模具有明显优势，在劳动集约化、劳动精细度和管理决策制定等方面小规模农场则具有优势。……因此，如果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仅仅是从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类型的经济优势和存续能力的角度出发，那么这个问题（规模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化约为如何对两种经济产生的整体经济效果进行量上的比较。这个问题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农业生产组织中会有不同的结果”（Chayanov, 1991: 209）。然而，遗憾的是，在斯大林集体化政策时期，恰亚诺夫的科学分析显然没有获得这样客观的评价与对待。

六、对中国农业的启示：小农户如何衔接现代农业？

恰亚诺夫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如何在小农户作为生产主体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效益，如何将数千万分散的小农户纳入国家发展的宏观计划之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适用。自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来，政府一直在积极培育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推动土地流转，加快规模化经营而形成的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可以看作以横向一体化来实现大生产的一种努力，然而这样的横向集中已然面临一定的限度和困境。一方面，土地流转进程虽快但发展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农业生产的“非粮化”，村庄治理的公司化，小农户利益的被剥夺以及农地流转冲突加剧等（叶敬忠等，2018）。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仍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农业农村部，2017），

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他们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已经涌现出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多元实践当中，小农户的主体性依然处于弱势，小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人格依附和市场依附的状态。未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点在于突破小农户的生产弱势、组织弱势和市场弱势，以土地规模化、组织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的方式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叶敬忠、豆书龙、张明皓，2018）。在这一意义上，恰亚诺夫关于农业组织中横向集中、纵向集中以及农户、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等主体在不同类型一体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对于我们夯实和利用小农户的主体性，加强对小农户的组织和服务，灵活实现规模经济等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启发性，对于梳理微观农户经营和宏观国家农业发展之间的连接关系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恰亚诺夫之所以被提及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20年代他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农业转型问题上的道路分歧。时至今日，恰亚诺夫的思想观点依然受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和诘难，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跳出理论派别的界限，重新审视恰亚诺夫农业思想的贡献。恰亚诺夫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非不可调和，实际上，恰亚诺夫认为他的研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Van der Ploeg，2017）。在对农政问题的思考上，他和考茨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小农户和小商品生产者”，劳动是这些小商品生产者收入与生计的核心（White，2018）。除对农民分化方式的不同解释之外（实际上两种分化方式共存于俄国农民当中），恰亚诺夫和列宁对于农业中机械的使用，技术的革新等方面持相同的积极态度（Bernstein，2009）。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沙宁对恰亚诺夫学术境遇的评价，恰亚诺夫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他跳出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局限，以混杂多元的视角看待农业与农民。对于农民，恰亚诺夫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农彻底否定的态度，也反对不加批判地信仰农民。恰亚诺夫理论中的农民，是世界经济中的一分子，是开放系统中的一员，是融合了微观-宏观、结构-行动不同分析维度的行动者。他们既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又反过来作为一个整体与宏观世界产生联系。对于农业，他既看到小农户在劳动质量和精细度上的独特优势，也看到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性与先进性，重要的不是非白即黑，而是如何在农业生产组织中将二者兼容并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是在现阶段众多小农户存续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论断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寻找适宜的“特色道路”。就这一点而言，搁置长久以来围绕恰亚诺夫的理论纷争，恰亚诺夫关于农民经济与农民合作的思想对于当下中国农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对恰亚诺夫思想更深入、系统的挖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理论融合，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农业转型做出更深入的分析与理解。正如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所说，“我们不仅有可能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关注社会结构及其对小农农场的影响）和恰亚诺夫主义的分析（理解具体的影响以及小农的应对过程）相结合，……而且常常也必须加以结合。这种结合的目的不是为了辨析二者的毫厘之差和想象的不兼容性，恰恰是为了使它们融合成为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2019：20）。

恰亚诺夫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不仅是一种农业经济思想。恰亚诺夫在论述中多次强调，合作社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经济制度。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只是一种帮助小规模商品生产者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是小生产者为了生存而抗争的武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合作社就不仅是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阶级的技术手段，而是被转化为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一（Chayanov，1991：22）。“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至少在我们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它从一个社会阶层，甚至是一个阶级的技术性工具转变成了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一”（恰亚诺夫，1996：268）。

恰亚诺夫所构想的，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农民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实现的乡村社会有序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这恰恰是当下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愿景。在纵向合作的机制下，一个将小农户有效组织和连接起来的，繁荣的现代农业产业，也必将为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邓大才，2013，《改造传统农业：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载《学术月刊》第3期。

侯建新，1999，《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载《世界历史》第1期。

黄宗智，2014，《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北京：法律出版社。

刘长江，2006，《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载《唯实》第21期。

[俄] A·恰亚诺夫，1996，《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秦晖，1996，《“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载《中国书评》第10期。

王道勇，2009，《小农制衰亡论的争议与现实启示》，载《科学社会主义》第5期。

许惠娇、叶敬忠，2017，《农业的“规模”之争与“适度”之困》，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熊春文，2017，《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载《社会学研究》第3期。

[荷]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20，《小农与农业的艺术：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叶敬忠、豆书龙、张明皓，2018，《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如何有机衔接？》，载《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张广翔、袁丽丽，2010，《19世纪40年代—20世纪初期俄国合作社的思想和实践》，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第6期。

郑杭生、汪雁，2005，《农户经济理论再议》，载《学海》第3期。

农业农村部，2017，《国新办举行政策吹风会，农业部副部长叶贞琴介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有关情况——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http://www.moa.gov.cn/xw/zwdt/201712/t20171219_6123309.htm。

Bernstein, H., 2009, “V. I. Lenin and A. V. Chayanov: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No. 1, pp. 55-81.

Bourgholtzer, F., (ed.), 1999, *Aleksandr Chayanov and Russian Peasants*, London: Frank Cass.

Chayanov, A. V., 1991, *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Danilov, V., 1991, Introduction: Alexander Chayanov as a Theoretician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A. V. Chayanov, *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 London: I. B. Tauris, pp. xi-xxxv.

Durlauf, S. L., E. Blume (eds.), 1987,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hanin, T., 2009, “Chayanov’s Treble Death and Tenuous Resurrection: An Essay about Understanding, about Roots of Plausibility and about Rural Russi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Iss. 1, pp. 83-101.

Van der Ploeg, J. D., 2017, “Differentiation: Old Controversies, New Insight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5, Iss. 3, pp. 489-524.

White, B., 2018, “Marx and Chayanov at the Margins: Understanding Agrarian Change in Jav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5, Iss. 5-6, pp. 1108-1126.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Pan L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来源：爱思想网 2020 年 03 月 31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